



复旦大学
韩国研究丛书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编

韩国研究论丛

(第十四辑)

——第二届中国韩国学博士生论坛特辑



世界出版 出版社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韩国研究论丛

(第十四辑)

第二届中国韩国学博士生论坛特辑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国论丛: 第二届中国韩国学博士论坛特辑 /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1

ISBN 978 - 7 - 5012 - 3084 - 6

I . 韩... II . 复... III . 韩国—研究—文集 IV . K312.6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1256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文字编辑 王 瑜
责任出版 林 琦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封面设计 阿 旻

书 名 韩国论丛: 第 2 届韩国学博士论坛特辑
Hanguo Luncong: Di er jie hanguo xue boshi luntan teji

作 者 复旦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 编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80 × 1230 毫米 1/32 10.625 印张
字 数 2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7 年 3 月第一版 200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084 - 6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石源华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少普 石源华 朴昌根

任 晓

庄锡昌 沈丁立 吴心伯

金光耀

金应忠 金重远 胡礼忠

俞新天

本辑执行主编：石源华

副主编：蒋建忠

本书由韩国东亚财团支援刊行

总 序

大约在一百年以前，韩国被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隐士之国”，该国的情况还鲜为世人所知，尤其是西方人士知之甚少。当时，欧美人士只知道这是一个远在地球东端边远地区无比寒冷的国家，那儿居住着一群信仰奇特宗教的神秘居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经过近百年的沧桑，风风雨雨，剧烈变迁，如今的韩国已经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国家。

回顾韩国人民经历的最近百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前 50 年是争取国家独立、摆脱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该民族的奴役，创建民族独立国家的过程；后 50 年是努力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力争使国家与民族踏入世界现代化行列的过程。

韩国人民用他们的英勇奋斗与艰苦劳动为本民族争得了独立和富强，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和赞扬。

韩国与中国是邻邦，又有着数千年的交往历史。按理说，中国人民对这么一位邻居应该知之甚多，知之甚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制约，中韩两国人民的交往一度被割断了数十年。中韩两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被限制在最小最简单的限度之内。因此，原本不应该如西方人那样把韩国视为遥远的“隐士之国”的中国人也把韩国视为一个十分陌生的国度，尤其是今日年轻一代中国人对其了解甚少。

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双方为对方打开门户以后，中国的“韩国学”，韩国的“中国学”研究立即兴起，并且蓬勃发展。这表明两国人民是多么渴望真切地了解对方。正如久违数十年的两位故旧好友，突然道途重逢。此时他们是惊和喜，询问是否别后无恙；然后则是急切地探悉彼此别后的遭遇与目前的境况。初始的激动心情平静以后还会探讨一下彼此之间是否有可能给予对方什么支持和帮助。

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当然不会像朋友之间私交那么简单与朴实，肯定要复杂得多。但是，有一点还是十分相似的，即彼此会急切地希望更多地了解对方的真情实况。1992年10月，即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两个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立了。在这以后复旦大学校内的许多朋友，还有一些校外的朋友，非常积极地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在此后短短的几年内，围绕韩国问题或与韩国有关的问题，我们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会、报告会……还有一批年轻朋友来复旦大学做博士生、硕士生，专心研究韩国问题。这一情况出乎我们原先的预料。

再回顾一下周围，可以发现在这短短一段时间内陆陆续续建立了多处韩国问题研究中心，“韩国学”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土成长。这正好说明今日中国境内的环境与气氛适合“韩国学”研究的发展。

这一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对“韩国学”给予那么多关注，是有许多理由的。我认为至少有那么几条理由，我们应该大力发展“韩国学”研究。

其一，韩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丰富文化生活内容的国家，这是世界上众多文化智慧宝库中的一座，而且有它自己独到之处，人们从这儿可以学习到许多历史文化知识，丰富人类的智慧。

其二，中韩两个民族是相处数千年的近邻，历史上有着密切的交往，从而也留下了诸多的历史问题，如何科学地、正确地看待这些问题，对于巩固与发展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睦

邻关系颇为重要。

其三，在近代，中韩两个民族还具有一段极其相同的历史遭遇之情，因而结下了互相支援、共同抗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血肉之情，有关这一段历史的内容，值得发掘与交流。这是我们两个民族共同的珍贵历史遗产。

其四，中韩两国过去几千年间社会形态、历史演变途径及近代的历史命运较为类同，然而在最近 30 多年里，韩国率先跨出了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步伐，走得又相当成功。韩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乃至教训，对今日的中国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作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种借鉴。

其五，为了在两个民族之间建立牢固的友谊，必须彼此充分地理解，而彼此深刻理解的基础就是彼此全面的了解。要了解就必须展开研究。彼此应该深入地研究对方，以求深刻地、全面地了解对方。一言以蔽之，为了两国的友谊，为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我们也必须开展韩国学的研究。

当然还可以举出许多理由。

正是从这种理由出发，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立以后，我们团结了一批朋友，从历史现状的诸多方面展开韩国问题的研究，并出版了《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丛书的内容涉及韩国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外交以及中韩关系等方面，现已出版专著十余本，发表论文数百余篇。

丛书的出版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关怀，也得到许多朋友的鼓励与好评，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计划一如既往，继续编纂这套丛书。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对于中国“韩国学”的发展有所裨益。

庄锡昌

1997 年 10 月 14 日

目 录

总 序	3 庄锡昌
-----------	-------

特别演讲:

论韩国儒学的特点	1 张立文
----------------	-------

一、朝核问题专题

朝核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的外交努力	25 龚克瑜
美国核威胁在朝鲜核选择中的作用	37 高奇琦
俄罗斯在朝鲜核危机中的利益、立场与作用	52 盛海燕
多边国际机制中的单边倡议与双边协调 ——以六方会谈的创设为例	66 潘亚玲

二、东北亚安全与中日韩关系专题

徘徊于“双边”与“多边”之间

——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路径选择	85 仇发华
东亚一体化的主要制约因素 ——从国际政治的视角看	98 彭述华
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的挑战与政府的作用	111 孙 霞
论中日关系与卢武铉政府的“东北亚均衡者政策”	124 [韩] 車在福
论“靖国神社”问题与中韩关系的发展	138 石建国

三、当代韩国问题专题

- 试析韩美 FTA 谈判的战略意义 151 [韩] 韩万圣
- 浅析韩国的 APEC 政策 163 [韩] 都允珠
- 金融危机前后的韩国金融改革 176 赵 瑛
- 韩国电视剧竞争力的决定因素——编剧
..... 188 [韩] 申惠善
- 从国际法视角解析韩日“独/竹岛”归属问题
..... 198 任 蓉

四、韩国历史专题

- 基督教与朝鲜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 213 王 青
- 试析李承晚时期韩国政党变迁的过程与特征 ... 222 郑继永
- 外交史与现代化进程的交叠
——美国学界“朝鲜战争起源研究”流派述评
..... 237 陈 波
- 危机政治：中国政府危机处理模式研究
——以朝鲜战争为例 257 蒋建忠

五、中韩关系专题

- 影响高丽与蒙古帝国早期接触的几点外部因素
..... 271 傅 骏
- 洪武时期明朝与朝鲜围绕女真问题的交涉初探
..... 282 于晓光
- 王徵与丁若鏞
——16 至 18 世纪中韩两位实学家对西洋奇器的
研究与制造 295 [韩] 安允儿
- 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的历史流变
——一种体系秩序的认知与建构 307 郭 锐
- 第二届中国韩国学博士生论坛综述 319 蒋建忠

特别演讲：

论韩国儒学的特点

张立文

儒学对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国的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教育、艺术、科技以及典章制度、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是东亚各民族精神的最重要的源头活水之一，也是东亚各民族不断创业的精神财富之一。

21 世纪人类和东亚共同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和各文明之间的冲突，并由此五大冲突而带来五大危机，即生态危机、人文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它直接威胁着人类和东亚的生存和发展。如何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东亚儒学文化能否对此做出回应，能否具有化解的资源？笔者认为，儒家创始人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便是化解此五大冲突和危机的指导原理和操作方法。它为人类的“安身立命”启示了方向，为家国的“修齐治平”开出了理路。这就是说，儒学在现代仍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全球理念的视阈中，在与中国儒学的比较中，来研究韩国儒学，可以显示韩国儒学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在和合学视野下，把韩国儒学的特点可以放在和体仁用、和体礼用、和体义用的视阈来观。还可以纵观、横观、合观三个方

面来看：纵的维度是历史演化，横的维度是对其横断面的概括，合的维度是纵横融突的和合。

从纵的维度来看，儒学在韩国的传播和发展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引进、受容、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融突期（从公元前三世纪到统一新罗、高丽时期），以儒家经验理性的道德伦理为特点；后一个阶段是发展、创新，与对佛道文化批判的和合期，以理学儒学的道德的形而上下相合一为其特征。细可分为四个阶段，前后均可分为二：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到三国时期为传授期，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为融合期，是为前期；朝鲜朝为造极期，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朝鲜朝灭亡，为延续期，是为后期。在此四期的演变过程中，儒学由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以及儒学自身的理论形态的变换、思维内涵的变化等外缘内因的转变，而呈现出其独有特点。这些特点是韩国儒教精神的精华，也是韩国民族精神的体现。

一、实践经验伦理

韩国作为一个实存的主体，儒学究竟何时传来、输入、受容、接触、起源、起点等^①，不仅在时间上见仁见智，而且在用词上各有千秋。笔者在此不想作价值的评判，只在时间上采取一种说法，为自己对韩国儒学的传授和发展的时段的划分上提供一种方便。

中韩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频繁交往。《魏略》记载：“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

^① 参见金忠烈：《高丽儒学思想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第15—24页。另参见拙著：《李退溪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① 春秋战国时，朝鲜与燕国已有往来，约公元前四世纪，朝鲜准备“兴兵逆击燕”，后乃止。秦末，天下大乱，燕、齐、赵人民惨苦，亡往侯准。人民在流入的过程中，不仅把中国的农耕、工艺、生产技术和商品、货币带到朝鲜，而且把礼乐文化、思想观念、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也带到朝鲜，如朝鲜发现的战国时“明刀钱”货币上铸有汉字，秦戈上的秦篆及汉武帝时铸的“汉孝文庙铜钟”的汉字等。

秦汉之际，“侯准既僭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后绝灭，今韩人犹有奉其祭祀者。汉时属乐浪郡，四时朝谒。”^② 卫满朝鲜汉时属乐浪郡，随汉建制，必传授汉代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汉时立“五经”博士，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术”作为主导的思潮，在属于乐浪郡的卫满朝鲜得到传授。如在平壤乐浪郡旧址古墓内出土的竹胎漆奁上，发现了孝子故事绘图，它与后汉武梁祠石刻相同^③。说明儒家“孝”的思想观念已被容纳，并运用到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

在古朝鲜和卫满朝鲜时期，“人性强勇”，民风淳朴，“国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④ 敬畏鬼神，特别是天神、天君的自然信仰。随着人民因政治的、经济的原因而频繁迁徙往来定居，儒学的传授主要是百姓日用层面的待人接物的道德行为，具有实践经验伦理的特点。因为当时掌握知识的士人是少数，广大的百姓不可能都去读《论语》、《孟子》等儒学的著作，也不可能理解，但知道父子之间、主仆之间应该“忠”、“孝”。虽然百

① 《乌丸鲜卑东夷传》，《三国志·魏书》卷 30，注引《魏略》，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850 页。

② 《乌丸鲜卑东夷传》，《三国志·魏书》卷 30，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850 页。

③ 参见金忠烈：《高丽儒学思想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2 年版，第 30 页。

④ 《乌丸鲜卑东夷传》，《三国志·魏书》卷 30，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852 页。

姓不知道为什么要履行忠孝的道理，但知道怎样去做，是一种实践经验的传授，是维持社会伦理秩序的需要，这就改变了上古“其俗少纲纪”、“无长幼男女之别”^①的状况，有了一种遵循社会伦理道德的自觉。这种自觉是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的体认，是人认识它自己的一种提升。

人一呱呱落地，他（她）第一眼看见这个生疏世界，不知给他（她）带来的是什么？同时他（她）看见了他（她）的母亲，这个在她肚子里孕育了10个月的并不生疏的母亲以及有血缘关系的父亲。因此，他（她）“孝”敬父母便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并由亲推及疏，这也合乎人的交往活动的亲疏远近的差异，所以，它是合理的。从古朝鲜、卫满朝鲜到汉四郡，由儒家到儒学的“孝”伦理道德及与“孝”相关伦理道德得以较普遍地传授，是合乎规律的，而具有经验性的、实践性的特点。

汉四郡时的朝鲜，由于属于汉的建制，所以在典章制度、礼仪形式层面，受儒学思想的渗透，礼法的底蕴已由“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注重内在道德教化和羞耻心的培养，而取代注重外在严刑峻法的单一性，使道德礼仪与政令刑罚相济相补。

到了三国时，儒学得以较全面的、普遍的传授，它不是仅停留在实践经验伦理的层面，而是向理性经验伦理转变，并以理性经验伦理为其特点。

高句丽建国（公元前37年）虽晚于新罗（公元前57年），但由于其地理上与中国东北大陆相接壤，而传授儒学较其他两国为早。它传授的已不是元典儒学而是汉代经学儒学。《旧唐书》记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扁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曄《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②《五经》

① 《乌丸鲜卑东夷传》，《三国志·魏书》卷3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51页。

② 《东夷传》，《旧唐书》卷199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0页。

为《诗》、《书》、《易》、《礼》、《春秋》，为儒学经典，史学和文学著作，亦体现了儒学精神。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立太学教育子弟”，这样从中央到地方，都以教授儒学经学、史学、文学为主，而不教授佛学。从国立大学到地方私立学堂，既要学习经学、文史，又要学“习射”等武艺、技艺，相似于孔子的“六艺”。学生们在学习中对儒学的体悟就不仅仅停留在知识接受上，而且也接受了儒学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礼仪制度。在近400年儒学文化与本土俗文化的融合中，两者已一体化，或曰儒学的本土文化。当公元372年佛教传入，642年道教传入时，并没有与儒教构成严重冲突。但由于佛、道的冲突，而造成高句丽的式微。

百济（公元前18年—公元660年）温祚王为高句丽朱蒙的儿子，他率臣民南下马韩而建国，原接受北方“经学儒学”的影响，即注重名物训诂之学，后又接受南方“玄学儒学”的义理之学，并把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融合起来，使儒学得以发展。“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①。在传授儒学载体的经、史、子学中，五经博士制度、国家典章制度（包括衣着、朝拜、“六佐平”、“十六官阶品”等）都得到加强。百济曾要求梁国派遣讲论《五经》的学者教授经传的义理。阿莘王十四年（405）五经博士王仁带《论语》、《千字文》到日本，传授儒学。百济儒学在融合汉代经学儒学与南北朝玄学儒学中，具有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兼容的特点。

新罗（公元前57年—公元668年）虽在三国中直接与中国儒学交流较晚，但其所建立的“六村”（部族）和谐协议制，使社会较安定，成为中国流民（包括知识分子）的归宿地，而带来儒学文化、道德伦理、礼仪规范等，促使国家体制得以完善起来。新罗直接与盛唐文化交流，在社会典章制度、伦理道德、礼俗生活等受儒教影响，同时亦吸收了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了在

^① 《东夷传》，《旧唐书》卷199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9页。

社会制度、政治道德层面以儒教为主导，在学术思想层面以儒、释、道三教融合为特征的思潮。其突出表现是“花郎道”。“花郎道”是以儒教与新罗传统爱民思想相结合为核心，融合佛、道思想的和合新生的一种形式。如果说百济是南与北儒学、训诂与义理之学的融合，这是儒学内部解释的转换，那么，新罗的儒、佛、道三教融合，便是儒学由内到外的融合，其融合的广度与深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新罗儒学的特点。

二、理性经验伦理

三国时期的结束，儒学发展便进入融合期，如果说从卫满朝鲜到三国是儒学的引进和传授，那么，新罗和高句丽的一统国家，便是以儒教为核心，融合佛、道为其特征。它经历了以实践经验伦理向理性经验伦理的转换并为其思想特征。

新罗统一高句丽、百济后，始终与唐王朝保持友好关系，“留学僧”和“留学生”大批赴唐^①，促使了学术交流的深入，“留学生”参加唐的科举考试，贡科及第者有 58 人之多。他们对于儒学经典稔熟精通，儒学精神体贴深刻，对于体现儒学精神的国家典章制度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对儒学的伦理道德身体力行，他们回新罗后便推动了儒学在各个领域的实践和发展。公元 682 年设立“国学”，“国学”以教授《论语》、《孝经》、《毛诗》、《尚书》、《周易》、《春秋》、《礼记》等儒家经典为主，几代国王也亲临国学听讲，地方学校亦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并以表彰孝子顺孙来提升、化育社会道德风气，而成为人人“知书喜学”的

^① 在安鼎福的《东史纲目·真圣女王三年条》记载：新罗常派王子宿卫于唐，并遣留学生入唐太学修业，修业以 10 年为限，期满令回国，另派人前往修业。留学生申购图书费用由本国负担，衣、食由唐鸿胪寺供给。参见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71 页。

“君子之国”。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遣邢琇到新罗，他对邢琇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① 玄宗有大国思想，这是历史的局限。他选儒学造诣高深，善与讲论的邢琇使新罗，亦从一个侧面说明新罗士人精通儒学，否则难与讲论。玄宗称新罗为“君子之国”，其美名远播，亦可知新罗礼仪法度、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已达较高境界。开元是唐之盛世，称其“有类中华”，确是一很高的评价。

新罗于元圣王四年（788）仿唐科举制度，以儒学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意，兼明《论语》、《孝经》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② 这种以读书三品出身授官，便使儒学与科举取士相结合，不仅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而且使儒学的现实社会价值得以发挥。国学中供奉孔子，也使孔子神化。这种读书出身科举授官，使中央到地方的政治机构的官员，都由儒者担任，儒教政治、伦理得以贯彻和实现。

新罗时杰出的儒学思想家有强首、薛聪和崔致远。强首（？—629年）认为佛教为“离世俗之外教”，而愿学儒教，他从师学《孝经》、《曲礼》、《文选》等，是精通儒教道义、礼法、文字、文章的大学者，是具有孔孟原儒道义和汉唐新儒文章而又融会贯通的大儒。在武烈王、文武王、神文王三代，他擅于解读唐朝的外交文书及撰写与唐、丽、济的国书。文武王认为，先王请兵于唐，以平丽、济者，亦有强首文章之助的功劳。

薛聪（约655—740年）是高僧元晓与瑶石公主之子，早期

① 《东夷传》，《旧唐书》卷199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37页。

②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元圣王四年条。